

“这是一个宏伟的、具有远大前途的事业。投身这个事业是很光荣的。大家既然下决心来干这一行，就要求大家终生献身于这个事业。由于工作性质的关系，干我们这一行是出不了名的。所以大家还要甘当无名英雄！”

赵 韦 · 著

C H I N A P O W E R

中 国 动 力

陕 西 新 华 出 版 传 媒 集 团 陕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中国 动力

赵韦·著

 **CHINA
POWER**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动力 / 赵韦著. —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6
ISBN 978-7-224-11988-6

I. ①中… II. ①赵…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39546号

中国动力

作 者 赵 韦

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邮编: 710003)

印 刷 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 ×1092mm 16 开 26.75 印张 1 插页
字 数 43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11月第1版 2016 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4-11988-6
定 价 78.00 元

前言

那年的青春

我七岁那年，跟着我爸我妈搬进了“红光沟”。在此之前，我家住在新疆的塔城，离中苏边境只有 12 公里。

离开部队大院儿的前几天，每天都有人到家里来跟我爸告别，“能回口里老家了，不错！”在新疆，内地被称为“口里”。

我爸就提高声音：“哪是回老家，是去一个大山里。”一边说，一边从摘掉了领章的军装口袋里抽出钢笔，再摸出一张卷莫合烟的烟纸，画上一个高耸的锥形山包，“实际上就是山尖尖上，有那么块平地，四周都是悬崖，骑自行车不小心就掉到崖下边去了。”更让我爸恼火的是，他在部队是团政委，“让我去当指导员，成了连级了。”

我看着他用那张画着山尖尖的纸片卷上莫合烟，擦根火柴点着，狠狠地吸上一口。袅袅青烟中，我万分忧虑，怎么爬到那个山上去？

那大概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对不确定的未来感到焦虑。

我们坐了三天的汽车到了乌鲁木齐，又坐了四天三夜的火车到了西安，然后又坐了一天的火车来到了位于秦岭深处的 067 基地。我发现，这里不是我爸说的山尖尖上，而是在山沟沟里。我爸还猜错了另一件事，这里的“指导员”不是连级，而是团级。

此后的很多年我都在困惑，为什么我爸会将这地方想象成那样？直到有一次，

他对我讲起了自己的经历，我才明白了这个意象的来源。1949年，他所在的部队一路西进解放了新疆，驻扎在和田。他是负责翻译电报的密电员，被派往中印边境的赛图拉哨卡驻防。孤零零的哨卡建在一个山尖尖上，海拔将近四千米，大半年的封冻期，方圆几百公里没有人烟，周围除了红柳没有别的植物。守卡战士一年一换防，密电员却没有换防的人选，他在哨卡守了两年半，见到的只有哨卡里的战士，吃的只有山下送来的干菜，那种艰苦和寂寞远非常人所能想象。所以我爸对“山区”二字非常抵触，他喜欢平原、喜欢热闹的地方。

虽然067基地所在的那条被称为“红光沟”的山沟沟里植被丰茂，但同样荒僻，山沟内只有一条17.6公里的狭窄沥青公路，沿途散布着车间、试验室、办公楼和家属区。每天只有固定的几个时间点有班车通行，错过就别指望再有车了。绝大部分时间，那条公路都是寂寞的，路上甚至见不到行人。

我爸妈在山沟的最深处的11所工作，公路快到尽头的地方，分出一条更狭窄的小路拐进另一条小山沟里，我爸的单位就在这条小山沟的最深处。那儿有一栋二层小楼，一楼是库房，我们一家就临时住在二楼的一间会议室里，我在那里度过了记忆中最冷清的春节。冬季的阳光十点以后才能照到小楼的楼顶，我时常趴在栏杆上，望着对面陡峭的山坡和山坡下的厂房，等着阳光从山尖上露出来。

三年后，那片厂房被坍塌下来的山坡彻底掩埋，我家住过的那个二层小楼也被山上滚下的巨石砸毁。我爸的同事，李秉钧叔叔在那次山体滑坡中英勇牺牲。

二

那时的中国西北、西南腹地，偏僻的深山之中，散布着众多“三线单位”。这些有围墙或没有围墙的“大院儿”里，有自己的医院、幼儿园、学校、食堂、商店、粮站、派出所、澡堂、理发室……是自成一体的小社会，他们与当地居民极少交往，更不说当地方言。他们都有自己的“标准语”。从“标准语”就可以判断出这个单位是从哪里迁来的。067基地大院儿的“标准语”是京腔普通话。

我曾是同学们的笑料，他们用带着北京腔的普通话，嘲笑我的新疆味儿普通话。其实，他们的父母都带着南腔北调的各地口音。但孩子们必定都是一口京腔普通话，否则，就会像我一样被嘲笑。迫于“社会压力”，几个月以后，我也学会了

这种带着京腔的普通话，到现在也是这样的口音，并且会一直这样维持下去。

我的同学们不但说着北京口音的普通话，并且还有很多人拥有北京户口。这曾经让我极度地羡慕，不是因为户口，而是因为他们每隔一两年，就会在寒暑假时，被父母送到北京住上一两个星期。不过，大多数时间里，他们和我一样，只能在家属区里或者周边的山坡上疯跑。

那时，我能见到的最繁华的地方，是十几公里外的龙口镇。火车站前那条不足百米的街道上，有一家两层楼的百货商店，楼上楼下加起来不到200平米。还有一个小小的新华书店，还有一家五金店，还有七八个小吃摊、杂货摊，还有……就没有了。那是山沟里最具有商业气息的所在，光是在那条街上转一转，就让我感到很幸福，更何况还能买一两件小玩意儿，吃上一毛钱一碗的元宵。我妈或我姐每年会带我去两次，寒假一次，暑假一次。我妈必须在上班时间请假带我去，因为星期天班车也停运。每次出行的前一晚上，我都兴奋得辗转难眠。

每年的农历二月二也是一个幸福时光，红光沟东边的河口镇有一年一度的大庙会，那是开春时的农用物资交流会，方圆几十里的当地农户、山民都汇集到这里，狭小的街道里满坑满谷都是人，那场面就像现在黄金周的旅游景点。我爸用自行车带着我，颠过四五公里坑洼的土路去赶庙会，给我买根甘蔗，再买一根长长的擀面杖或铁锹把。我兴致勃勃地扛在肩头，跟着我爸踩着满地的甘蔗渣挤到路边小摊上，吃一碗凉粉儿。在那条人头攒动尘土飞扬的土街上，可以遇见我所有的同学，他们同样兴高采烈地扛着长长的甘蔗和木棒跟在父母身旁。擀面杖或铁锹把不是工具，是我们的玩具。

三

我少年时期的世界里，没有陌生人，因为能见到的，只有几个家属院里的那些人，只瞟一眼背影，我就能分辨出那人是张三他爸还是李四他爹，不过，对他们的了解也仅限于此。

在我爸单位的会议室住了三个月，我家搬到了一个只有五栋小楼的家属院。住在楼下的耿宝林叔叔从来没叫对过我的名字，大概因为我哥名叫赵新辉，他就想当然地叫我“赵辉”，而且这样一叫就是三十多年，前几天在路上遇见，还是这样叫我。

那时候,我不知道耿叔叔干什么工作。天天见他在锅台边熟练地烧柴引火,满身灰蓬蓬的,还常见他跟儿子一起在院子里劈柴,或者用简陋的铁模子打制蜂窝煤,觉得他就是烧锅炉的。其实,家属院里的叔叔伯伯们都是这幅模样,我爸也经常带着我哥在院子里劈柴、打蜂窝煤,同样灰蓬蓬的。

十几年后,跟一个朋友闲聊时我才听说,耿叔叔竟然是清华大学毕业的。然后又随口提到几位叔叔,居然都毕业于名牌大学,甚至还有“海龟”,都是名号响亮的设计师。

那时我才突然意识到,这些在一个院子里生活了十几年的张三他爸、李四他爹,这些穿得灰塌塌像锅炉工一样的伯伯、叔叔们,居然就是我们当年写作文时,想要成为的那个“理想”!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宣传画上,科技工作者不是应该穿着雪白大褂、戴着深邃眼镜、梳着精致分头,背后还环绕着飞机和导弹的吗?

原来理想与现实的距离居然这么近!可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咋就这么大呢?

十八九岁时,我天天抱着吉他唱着《外面的世界》,其实不知道外面世界会有怎样的精彩。我没想过父母和他们的同事们为什么要猫在这条山沟里工作,更没想过我和我的朋友们为什么要在这里生活,我以为世界本来就是这般模样,唯一觉得不方便的,就是买不到齐秦的正版《狼Ⅱ》磁带。

那条红光沟里的办公室、试验室、生产车间都用围墙圈起来,形成一个个独立的办公区,薄薄的青砖围墙外就是当地农户的村舍和农田。墙内的人,在研制飞往太空的火箭发动机,那是20世纪最尖端的高科技技术。墙外的人,正手扶着直辕木犁驱赶着黄牛翻耕土地,那是汉朝时期就使用的劳作手段。

一墙之隔,却是两千年时空的遥望。

我熟悉的那些伯伯、大妈、叔叔、阿姨们,都曾在北京、上海生活,还有人曾在国外留学。他们经历过都市的繁华,见过外面世界的精彩,领略过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却在青壮年时钻进这偏远的深山,寂寞地坚守二三十年,走出大山时已年过花甲满头白发,他们心中该是怎样的滋味?

曾有位朋友得知我在深山中的三线单位生活过,问我:“听说那种单位里,都是近亲结婚?”这让我哭笑不得:“那种单位里,最低也得受过高中、技校的教育,高级知识分子一抓一大把,你觉得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吗?”

其实,这是对单位同事之间“子女联姻”以讹传讹为“近亲结婚”,三线单位中,确实有很多家庭因为子女联姻成为“亲家的亲家”或者“亲家的亲家的亲家”。

那是三线单位共有的生态环境,第一代三线工作者“献了青春献终身”,到了就业年龄的子女们都是非农业户口,却远离城市,要工作就只能“献了终身献子孙”,第二代也都在这里安排就业,这些被“献”的第二代三线工作者到了婚恋年龄,也只能在大院中找对象。

张家的大女儿嫁给了李家的大儿子,两家结成了亲家;李家的二儿子娶了王家的三闺女,张家和王家成了“亲家的亲家”;王家的二女儿嫁给了孙家的大儿子,张家和孙家又成了“亲家的亲家的亲家”……以此类推,红光沟里很多家都可以推出这种拐了八竿子的“亲戚关系”。

这样的特殊生态背后,是两代人对国家的默默奉献。

四

我曾经看到别人写“故乡”的文章就觉得羡慕,我出生在部队大院,生长在067大院儿,户口本籍贯栏里那个陌生的地名是我父亲的故乡。对于我这种不知乡关何处的人而言,父母在哪里,故乡就在哪里。于是,我的故乡就从新疆的塔城,变成了陕西凤州的红光沟,现在又变成了西安的航天城。

在航天六院家属院里,能见到很多私家车上挂着“067XX”或“XX 067”的车牌号。这种牌号的车主必定是出生在067基地职工医院,从幼儿园到小学再到中学直至参加工作都在这个大院儿里的“067二代”。虽然“067基地”已经取消建制,但对于他们而言,那不仅仅是一个单位代号,而是和我一样,将它视为“故乡”的代名词。那三个数字组成的符号,承载着我们这一代人所有喜怒哀乐的过往岁月,是那段生命中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事,是内心深处最安稳的归属。

搬出红光沟几年后,我曾专程回去探访,家属区的房屋都被当地农户购买,有的继续使用,有的拆除卖了砖瓦,有的改成了猪圈。厂房、办公楼大都闲置,破败不堪,窗户上只留下豁豁牙牙的玻璃碴儿。那座承载着我快乐、苦恼时光的中学教学楼,只剩下一堆破碎的砖瓦,操场被洪水冲得只剩下三分之一,长满荒草。也许用不了多少年,那里的一切都将被人或者自然的力量涂抹得不留痕迹。

我很怀念红光沟里的生活，但不想用那块小小的车牌表达对那段岁月的留恋。大概是10年前，我就曾想写写那段经历，却不知从何说起。我姐夫卢振华是位作曲家，他说：“要是能把1981年那场大洪水写出来，那真是史诗一样的作品。”我没接话，我不想写史诗，只想弄点风花雪月。

2013年，我写的《十一维空间》出版后，责任编辑屈奇对我说：“我们又策划了一个选题，以航天六院为背景，用一个人、一个单位的故事展现中国航天的发展。你是航天六院的子弟，这事你来干吧。”他说的“我们”还包括韦禾毅。两人是出版社的部门主任，对我多方提携，《十一维空间》就是在他俩的力荐下，才由我执笔。

“写067，当然愿意！”既然这么多年也没弄出风花雪月的东西，那就写点有历史感的东西吧，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开始着手写作的准备工作。

五

接到写作任务的第二天，我就开始联络熟识的伯伯、叔叔们，到他们家中采访和收集资料。

我去过贾伯雄叔叔家，他是1956年第一批进入老五院的大学生，此时已经靠在病榻上，思维支离破碎，讲不清往事，但提起那些岁月他便激动得痛哭失声。那泪水不是为经受过的艰难而流，是为他一生中最引以为傲的付出而落。

我去过姜福来伯伯家，他的听力已经严重退化难以交流，在保姆的高声“翻译”下，得知我的写作计划。他拄着拐杖颤巍巍地起身，艰难地挪着脚步往里屋走。我想去搀扶，他却推开了我的手，保姆说：“这老汉硬气，从来不让人扶。”

姜伯伯从书房里拎出一只无纺布袋，慢慢地走出来，那四五米的距离，他走了足有一分钟。他坐在沙发上，打开布袋，掏出厚厚一摞材质不一的纸，有信纸、作业本、账单、绘图纸……每一页上都密密麻麻写满了或工整或潦草的字。“我耳朵不好，说不成了……这是我以前写的……工作回忆……你拿去。用完还给我。”他的目光久久地落在那些泛黄的纸张上，那里面有他的光辉岁月。

很多老人已经因为身体原因无法回忆过去，还有很多老人已经永远地离开人世。我知道，他们每个人的经历，都可以写成一本书，只是我的采访开始得太晚，失去了探访那个时空的机会。

姜福来伯伯还给了我十几张卷边的老照片，都是1981年那场洪水过后的场景，背后标注着时间和地点，都是我曾熟悉的地方。在一张照片的背景中，我看见了一个身影，他手持铁锹站在凌乱的路边侧身张望，我突然觉得鼻子发酸。那是我哥，那年他19岁，那时他每周六都“教训”我，在照片中再次见到那时的他，我却觉得无比的亲近。

1981年的那场特大洪水过后，山沟里18岁以上的男孩都要参加劳动，用铁锹、铁镐挖出埋在淤泥中的机器设备、金属材料，我哥也是其中之一。他挖了两个月的淤泥，拿到了40多块钱的劳务费，我爸妈舍不得用这钱，让他自己留着。他跑到龙口镇的那个商店，花12块5买了一件人造革的皮上衣，又花10块钱买了一台简易照相机，机身是塑料的，连镜片都是塑料的。那是山沟里能买到的最高档、最时髦的商品。

他兴奋地带着我和我姐去山坡边照相，非让我们爬到树上摆POSE。后来我发现，同龄的伙伴们都有站在树上的照片，这应该是山沟里的标准像。那时我不会爬树，挣扎着上不去，我哥就呵斥我，“笨成个猪了，树都不会爬。”我哭着鼻子回了家，再也不让他给我拍照。很多年后我玩起了摄影，并且依然不会爬树，并且绝对不拍爬树的照片，不知是不是跟这次经历有关。

六

在随后的采访中，航天六院宣传处为我提供了极大帮助，驻北京办事处的法进姐姐带我拜访了李伯勇先生，这位远程洲际导弹发动机总设计师，曾先后担任原067基地主任，原航天工业部第一研究院院长、总工程师，劳动人事部副部长，四川省省委副书记、副省长，劳动部部长、党组书记。

“我已经离开航天部门很多年了，1958年进去，1986年离开，28年时间，我非常怀念那段生活……”李伯勇的声音突然哽住，抬起左手捂住双眼，这位80多岁的老人已经泣不成声：“……我……对不起那些老三线，我自己先离开了，他们默默无闻地坚持了那么多年，有的还牺牲在那里。我们如果不把那段历史写好，真对不起那些同志。”

他平缓了一下情绪，继续说：“你应该写基层工作者，还有那些优秀的政工、后

勤人员,如果没有他们勤勤恳恳地从事各种保障工作,我们这些搞技术的也干不出什么事。”

他担心我掌握的资料不够多,将自己保存的科技人员回忆文集送给了我,“这些老同志的回忆文章都很实在,你拿去参考。要多掌握资料,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才能写出好东西。”

采访间隙,我专门去探望张静山、武超然夫妇。在红光沟的时候,我们两家曾做过三年的邻居,他家的小儿子大我两岁,带着我一起练“迷踪拳”,其实就是没有师父教的乱打一气。1994年,他们夫妇退休后回到北京,住在原067基地北京办事处位于东高地的宿舍区,家属楼还保留着1970年代的模样。“我们还生活在上个世纪。”张叔叔跟我开着玩笑。

60平米的房子挤着他们和儿子、儿媳、孙子三代人,“这套房子是我退休后专门批给我的,航天部和067基地的一等功我得过三次。”这让我颇为吃惊,“那您就跟我说说吧。”做邻居时我还年幼,根本不在意他干什么工作,只记得他做饭很好吃。他的讲述更让我意外,夫妇俩分别是1957年和1958年进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居然都是“元老”级的航天人。

房子的问题是老两口心中的一个结,如果在西安,以他们“研究员”的职称可以分到180平米的房子,但老两口无人照顾,于是回了北京。儿子、儿媳在北京的邮局工作,一年的工资就算不吃不喝,也买不了北京五环边的半间厨房,只能挤在父母家。北京东高地的航天大院儿里,已经建起一片片高楼,可他们的单位隶属关系不在此地,只能看着那些宽敞的新房一声叹息。这是“三线人”的无奈,拿着北京户口,生活在北京,却是不属于这里的外地人。

七

我用了半年多时间进行采访和资料整理工作,我想尽可能多地了解父辈们的经历,用一个个真实的故事,让“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航天精神生动起来。因为在我的眼里,那些“特别”并非空洞的口号,而是生活在我身边的这些熟悉的伯伯、大妈、叔叔、阿姨们,是他们的喜怒哀乐,是他们的工作生活。

正式写作刚开始,我就陷入了困境之中。中国开展航天事业已经 60 年,不仅时间跨度漫长,并且由于工作的特殊性,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经历所有事情,所以只好采用“漫写群像”的方式描写这个特殊的群体,但千丝万缕的头绪让我的行文越来越艰难。我想起我哥拍照时说我“笨成个猪了”,那时我可以率性地转身就走,可现在,我却不能走开,哭着鼻子、硬着头皮也得爬上去。

2015 年 9 月,当写作陷入最艰难的困境时,我在大院儿里的通知栏上看见了一张讣告,贾伯雄叔叔去世了。盯着那张小小的讣告,我脑子里浮现出贾叔叔坐在病榻上努力回忆往事,却无奈落泪的模样。我本想写出那些他亲身经历过却已经无法讲述的事情,并亲手送到他的面前,可书稿只写了不到一半,他已经永远地离开。

11 月 16 日,11 所的李在华阿姨也因病去世,我跟着姐姐一起前去吊唁。家中没有灵堂,连遗像都没有挂,她的丈夫邱邦华叔叔颓然地靠在沙发上,旁边几位叔叔、阿姨轻声地劝慰。

李阿姨的女儿邱雪梅姐姐跟我们说,按照妈妈的遗愿,后事一切从简,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我爸我妈很早就商量过,在西安和成都老家都不买墓地,去世后骨灰带回红光沟,撒在他们曾经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听到这番话,我不禁眼眶潮湿,老辈的航天人,将自己的大好年华留在那片大山深处,又将那里选作自己的长眠之地。那片大山见证着他们的光荣与梦想,承载着他们的青春与永生。

人生没有值得不值得,只有愿意不愿意。那些默默无闻的航天人愿意为中国的腾飞奉献自己的青春、自己的生命,我愿意为记录下他们曾付出的艰辛和汗水而忍受寂寞与痛苦。

在将近三年的时间里,我屏蔽了一切社会活动,每天枯坐在小屋里,对着电脑和一大堆资料。我放弃了几次“轻松挣钱”的机会,即便面临“绝症”威胁时,也不曾放弃写完这本书的决心。我愿意!仅此而已。

记得在采访期间,有几位熟识的伯伯、叔叔曾对我说:“小子,真行啊!”我很高兴这次的写作计划被他们赞赏,其实我是想用这本书恭恭敬敬发自肺腑地对他们以及数以万计的中国航天工作者们说:

“你们,真行啊!”

目录

上卷 铸剑

- 第一章 安得倚天剑 \ 3
- 第二章 壮志起东风 \ 81
- 第三章 直上重霄九 \ 107
- 第四章 为国做干城 \ 143
- 第五章 飞向太平洋 \ 185
- 第六章 众志战洪荒 \ 230

下卷 飞天

- 第七章 再启新长征 \ 261
- 第八章 丹心照日星 \ 312
- 第九章 吴刚何所有 \ 329
- 第十章 逐梦开新境 \ 356
- 后 记 动力与坚持 \ 403

— 上卷 —
铸剑

这是一个宏伟的、具有远大前途的事业。投身这个事业是很光荣的。大家既然下决心来干这一行，就要求大家终生献身于这个事业。由于工作性质的关系，干我们这一行是出不了名的，所以大家还要甘当无名英雄！

第一章

安得倚天剑

1956年7月，22岁的王桁从交通大学毕业，可他的报到证却迟迟未发。他的心中焦急不安，去学生科问了几次，得到的回答都是“你别急，再等等”。可眼见着同学们都领到报到证，纷纷离开学校去工作单位报到，自己却依然在等待，他不知道出了什么状况。此后的两个月中都在惴惴不安中度过，直到9月初，新学期已经开学，他终于领到了报到证，服务单位一栏上写着——“国防部第五局”。

学校里与他一同分配到国防部的还有七名毕业生，因为分别来自不同的专业，相互之间并不熟悉。他们不知道国防部第五局是什么样的单位，也不知道去干什么工作。他们更不知道，几个月前他们就被选定出来，这么晚拿到通知，是因为那个神秘单位曾到他们每一个人的家乡调查各自的家庭背景。

王桁和同学们扛着行李挤出北京前门车站，就看见车站广场边“国防部第五局接待处”的牌子，接待人员一一查对了报到证后，让他们登上一辆停在旁边的军用大卡车，一路开出了西直门外，过了紫竹院公园再往西南方向走了500多米，汽车停在车道沟的一个院子门口。

院子周围是大片的农田，没有几户人家，南边还有一片乱坟岗。一行人看着那个紧闭的大门和风吹日晒褪了色的院墙，心都凉了半截——国防部，怎么会在《聊斋》里才有的地方！大门旁挂着的牌子更让王桁和同学们泄气——解放军第

466 医院。

他们心中还怀有一丝希望，“可能是让在这里先做体检吧。”

院子里有三栋三层小楼，还有一排足有三十多米长的平房仓库。没有穿白大褂的医生、护士，甚至除了门卫和开车的司机，也见不到穿军装的军人，见到的都是穿着便装的年轻人，生龙活虎的样子，不像是病人。

一位后勤管理人员热情地接待了他们：“欢迎大家，咱们这个单位刚组建不久，你们是这里招收的第一批大学毕业生。”

王桁心里一沉，还真是在这儿工作！

“咱们这儿是什么单位？是医院吗？”一个同学怯怯地问了一句。

“国防部五局呀！”管理员说，“这是临时借用的办公地点，咱们工作和住宿都在这儿。”

“那我们来干什么工作呀？”王桁忍不住问道。

管理员依然面带微笑：“你们现在不用问，该告诉你们的时候，自然会说。还有，咱们这是保密单位，以后的工作中，与自己工作任务没有直接关系的，不该问的不问、不该看的不看、不该听的不听。这里的任何事情，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外不告亲朋。跟任何人交谈、写信绝对不能提单位的工作性质和工作内容，总之不能对外界透露任何情况。”管理员说完，就带着他们前往宿舍区安排住宿，王桁和他的同学们被这一连串的“不”镇住了，心里充满了好奇却不敢再多问。

所谓的宿舍区，就是医院住院部，四人一间病房，每人一张带轮子的病床。王桁抓着床头来回推了几下，“哎，这东西好啊！行李放上去，推着就走了，搬家很方便呀。”

宿舍区已经住着很多身着便装的年轻人，看样子也是刚毕业的学生。放下行李没多久，王桁就认识了隔壁宿舍的贾伯雄和宋承河，他们是天津大学机械专业的毕业生，几天前就来报到了。贾伯雄是个大嗓门，直来直去的豪爽性格，很好相处。王桁跟他熟悉了，忍不住问：“你们来了这些天，都干什么工作呢？”

“没工作，就是政治学习和保密教育。”贾伯雄说，“学半天，完了就自由活动，聊天、打球都行，说是让大家增进相互了解。还组织我们到北京的名胜参观过两次。”

“不说干什么，就这么闲待着？”王桁说。